

## 辗转的教育:异地借读与教育获得

季春梅<sup>\*</sup>

〔摘要〕以“教育获得”及其影响因素的视角,辗转的教育之问题的揭示及反思对教育公平的研究有着切实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对异地借读现象的研究与分析,将城市借读学生的教育机会的获得与学业水平的提高称之为“辗转的教育”,其内涵为:城市家长根据自身资源优势所作出的辗转的选择策略;城市家长为子女争取的辗转的向上流动的机会阶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模糊界限。

〔关键词〕教育获得;异地借读;辗转的教育

地位获得模型是美国学者布劳(Peter Blau)和邓肯(Otis Dunca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著名理论。该理论确立了以家庭资源理论为主流的解释逻辑,即以家庭所拥有资源的多少来解释其子女的教育机会获得及成就<sup>①</sup>。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此模型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提出了教育期望、家庭结构、社会资本、制度等因素,对教育获得进行了更为综合的阐述。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异地借读现象。即,为获得更好或更适合的升学教育机会,将学籍保留在原学校,而学生在学籍所在行政区域外的学校就读的一种获取教育机会的现象或策略。异地借读其实有两种情形,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子女随其父母到外地学校借读;二是城市家长送子女到县域优质学校借读。本研究只针对后者,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田野调查,以更丰富、宽广的视角对“教育获得”的过程、结果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等进行更深刻的挖掘与分析,以此获得更为理性和独到的认识,揭示一些深刻的矛盾和问题。

本文把城市中产阶级家庭<sup>②</sup>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城市某些中产阶层家庭在其子女因种种原因未能在所在城市进入优质高中的情况下,利用其自身社会资源的相对优势,在城市二流、三流学校和县城一流县中之间如何做出选择,以及这种“辗转的教育”的成效如何,影响如何。

本文选择东部沿海某省的一所县级重点中学作为标本,该中学城市借读学生占全校人数的比例最高时可达52.3%,颇具典型性。

---

<sup>\*</sup>教育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210013。

<sup>①</sup>P. M. Blau &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163—205.

<sup>②</sup>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在本文中主要指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家庭主要成员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者是企业的管理者、私营业主等等。

一、异地借读的一举双得:成“才”与成“人”

(一) 成“才”

城市借读生借读效果好不好,最重要的指标是看学业成绩。本文采取量化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量,观察点分别是:借读生考试成绩的班级排名变化、借读生及其父母对于他们高考成绩满意度。

1. 借读生考试成绩的班级排名变化

高中每个学期都会通过单元测试、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等,对学生进行不同学科、不同范围的考察测试,以了解学生的一定时间段的学习成效。一般情况下,城市借读生刚入校时,成绩多数是很低的。笔者主要依据该校借读生的班级考试成绩排名的变化来动态地研究其学业成绩的变化。

调查分两次进行,两次调查的时间间隔为6个月。第一次调查在该校高一、高二、高三每个年级各三个班级中共随机选取了304位借读生作为调查对象,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是借读生初入校时班级考试成绩排名和填写调查表时的班级考试成绩排名。调查结果显示:304位借读生的平均名次呈上升趋势,年级越低,进步幅度越小。如高一(2)班30位借读生班级考试成绩排名,其平均名次上升了4.2名。高一年级三个班级共101位借读生的平均进步名次是3.93名。高二年级共98位借读生,班级考试成绩排名平均进步名次为10.27名。高三年级平均进步名次为14.37名(见表)。可见,随着借读生在该中学学习时间的增长,他们的学业成绩进步幅度也随之加大。

表 借读生班级考试成绩排名变化(名)

年级	班级	班级名次变化(名)	年级平均名次变化(名)
高一 (101人)	2班(30人)	4.2	3.93
	3班(35人)	3.9	
	9班(36人)	3.7	
高二 (98人)	4班(33人)	9.8	10.27
	6班(32人)	10.7	
	16班(33人)	10.3	
高三 (105人)	3班(35人)	13.1	14.37
	8班(36人)	14.8	
	13班(34人)	15.2	

第二次班级排名调查以质性研究的访谈方式开展。访谈对象是选取接受过第一次调查的36位借读生(每个年级12位)。(由于该中学各个平行班之间的平均成绩都相当,为研究方便,假定所跟踪的高一、高二每个班的4位同学在后面所新入的班级和原来的班级总体成绩相当),访谈内容主要是借读生谈自己在校学业水平变化。第一次访谈对象为12位刚知晓其高考成绩的高三学生。

2. 借读生及其家长对高考成绩满意度

通过电话采访12位高三同学及其家长,笔者了解到:考上本科第一批次大学的学生有3位,本科第二批次大学的学生有5位,本科第三批次的学生有3位,专科学校的学生有1位。在如何看待高考成绩与自己原先的期望值这个问题时,12位中有7位表示“很满意”,1位表示“比较满意”,2位表示“还可以”,2位表示“不行”。从表示“很满意”的同学在电话中的情绪和话语里,可以感觉到,最终的高考成绩对有的人来说实现了预期目标,有的甚至是大大超出了预期目标。其中好几位同学表示,自己

到该中学就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他们了解到,和他们原来成绩差不多却仍然留在原城市就读的同学,很多都没有自己考的理想。一位女同学意外考上本科第二批次学校,而且和本科第一批次学校分数线只差3分。其本人及家长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因为按照他们原先的预测,能够考上本科第三批次学校都未有把握。2位表示“还可以”的同学表示,“虽然考上了本三,达到了父母的期望,但回过头想想,觉得还是可以考得更好一些的”。表示考得“不行”的同学则说,没有考好是因为考试英语科目时,考场的听力播放器出了问题,使得最终结果并不理想,只考上S省的一所民办本科学校。他想再复读一年,但妈妈没有同意,建议他如果实在不愿上本三学校就送他出国念本科。A同学的父亲说,“儿子最后的考试比本科第一批次学校分数线高出了20分,实际上当初的期望只是能够达到本科第一批次学校分数线就可以。那些在省城和他儿子成绩差不多的同学都没有他考得好,要么考的是本科第二批次学校、本科第三批次学校,要么考取的学校在西部地区。”D同学的母亲说,“儿子考上一所师范大学的民办学院。这所学院的录取分数不低,和他原来成绩相当的同学相比,他考上这个学校也是不错的。”

## （二）成“人”

与成“才”相对,这些城市家庭把孩子送到学习生活条件并不太好的县城学校去借读,其实还有另一层考虑,就是希望孩子受到一些在城市和父母身边都没有的磨练。他们认为,就算孩子在学业上没有多少提高,但如若能够在做人处事方面有进步,那也是值得的。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该中学军营般生活的磨练下,借读生们成长了。学会了不少必要的生活技能,生活自理能力大大增强;通过自己动手劳动,体会到了父母的辛勤和付出,懂得了感恩;在集体生活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很多学生对于农村孩子在艰苦条件下依然能够具有自强不息、勤奋学习、自律自制等品行表示钦佩,也萌发了对于自身家庭的满足感、幸福感。家长对于孩子在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十分欣慰。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教育是一种“再生产”,因为它同时生产和再生产了“统治”集团的精神和道德品格。笔者在访谈中向家长询问是否后悔送孩子到县城学校借读时,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明确表示“不后悔”、“很值得”。

## 二、异地借读的结果分析:对农村学校教育的挤压

城市家庭将其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相对优势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优势,减少其在升学过程中的竞争压力,或者说将部分竞争者排挤出局。并且,城市家庭凭借某些人脉、地位及经济资源价值在县城场域中的效应,也对其子女的学业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切实的帮助作用。对于每个班级中都有几乎占一半人数的这部分特殊群体来说,这些借读生们的教育机会的获得和学业水平的提高,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对农村学生教育机会的挤压、缺失以及学业水平的下降。挤压包括“直接挤压”和“隐性挤压”。

“直接挤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招生名额是有计划性的。在优质高中每年的招生过程中,其计划内招生名额是由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择校生也是根据占计划内招生的规定百分比来进行的。但是,借读生的招收名额数则弹性较大。其“准入”资格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学生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的价值含量是关键因素。相比较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往往处于劣势。第二,学校班级人数的容量是固定的,城市借读生多了,农村学生必然少了。第三,学校的各项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诸如各项实验设备、图书资料、文体器材等,城市借读生使用多了,农村学生的使用机会就变少了。

“隐性挤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职员工的数量和精力投入。他们在承担批改作业、课后辅导、联系家长、特殊事件处理、宿舍食堂管理等工作中，精力的投入与学生的数量明显呈正相关关系。教师们由于种种因素，往往将更多关注给予了借读生，而且在学校相关政策的配合下，极有可能转化为教师的一种自觉行为。由于教师对一些来借读的特殊家庭的子女的特殊期望和特殊压力，而且这种期望和压力某种程度上在学校制度化运转中已经转化为教师的一种“自觉”行为，势必会对当地在籍学生形成某种潜在忽略。当然，这种忽略也许并不是教师刻意造成的，可能只是因为这部分学生在这类教师的眼里基本上已经“上道入轨”了，无需给予特别关注和投入。但是这种潜在的忽略或者说是无意的忽略，无论如何对农村学生来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隐性挤压”。二是升学决策。由于农村学生家长对升学风险承担能力差或对教育预期收益评估较低，一些家长会过早地劝孩子退出升学竞争。低阶层支付教育的成本能力还不是主要问题，而是他们担忧相对的机会成本太大，因此想要退出。这种退出不是由于谁公开地设置出“触手可及”的门槛阻隔，而是在受教育权机会均等的名义下，低阶层家庭基于理性而作出自愿、无奈的选择。

### 三、异地借读的“辗转策略”

在从城市到县城的异地借读过程中，亦呈现了城市家庭在特定的教育时期内的教育定位、选择行动以及教育目标的考量。

#### （一）辗转的选择：从城市到县城

城市家庭面对子女代际教育水平可能下降的危机时，“为了避免永久性的劣势，个人必须学会将自己的作为活动的中心，作为他或者她自己的自传、能力、定位和关系等方面的计划者”<sup>①</sup>。为了孩子今后的发展，城市父母不仅要思考和制定相应计划，还要通过各种努力来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一旦做了选择，他们也需要继续努力来维持他们在下一阶段教育竞争中的优势。对于城市家庭来说，高中教育由于更加接近高考，其面对的选择往往更加艰难。选择学校需要注意风险性是否最小化，或者在将来是否能够对风险进行最大化地控制。在关键时刻，城市家长需要能够使用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资本来确保机会和利益。“风险越大，他们所必须做的决定和选择就越大”<sup>②</sup>。

首先，他们会重视并听取以前曾去县城借读学生的家长信息。那些已经毕业学生的家长介绍的借读经验，成为这些城市家长在子女就学选择时的重要依据。当然，他们也做好了有可能孩子并不适应县城而“打道回府”的最坏打算。其次，他们会计算成本。在这些家长看来，虽然需要为孩子付出一笔借读费用，还有去看孩子而往返于两地之间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但这与孩子在城市就读，奔波于各类校外培训辅导机构而投入的时间精力和不菲费用等等相比，他们仍然觉得异地就读更加划算一些，并且这些投入可能产生的效果比在城市要大得多。第三，资源的有效性。本次调研发现，这些城市家庭将家庭的社会资源在县城学校里能起到积极的效应。虽然入校时他们的孩子成绩落后，而且是外地人，但在该中学内这些孩子却丝毫没有受到人为性的或者制度性的歧视。相反，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多数被置于高度中心的位置，这与他们父母社会资源的发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这种“资源相对扩大模式”为城市家庭获取最为便利、可行的教育路径提供了操作基础。

---

①U.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Newbury Park, C A: Sage, 1992.

②U. Beck, *The Politics of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 （二）辗转的阶梯：向上流动的机会获得

城市家庭选择异地借读给子女创造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也为改善子女的后致因素（如能力和努力）创造了条件。公共经济学中将那些可供全体居民或部分居民消费或受益，但不需要或不能够让这些居民按市场方式分担其费用或成本的产品称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教育中，公共产品则是指由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必须予以保障的国民教育，某一个个体在接受某种教育的同时，不会妨碍其他个体也能接受同种教育，且随着接受某种教育的个体数量的增加不会带来该教育成本的增加。作为基础教育阶段而又不属于义务教育的高中教育，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所以，高中教育是属于介于公共产品与私有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也就是说，作为紧缺教育资源的准公共产品的这一性质，高中教育为城市家长利用社会经济地位优势为子女未来人生的向上流动阶梯打下基础而提供了可能性。

在调查中，通过对304位城市借读生的问卷调查发现：这些城市家长把孩子送往县城，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满意的教育机会，而且孩子的学业成绩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82.7%的借读生对高考成绩感到“满意”或“还可以”。而学业的进步和提高，使他们得以进入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这种“传递性”使升学竞争压力减轻和阶层分化提前。<sup>①</sup>因为有了良好的教育水平，以后拥有良好的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李煜<sup>②</sup>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阶层的教育差异是不同的。他认为，“文革”时期由于绩效主义选择原则的废除，文化在生产模式中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机制无从发挥作用，因此，不同阶级的子女教育获得的差异较小；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则会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主导模式是文化再生产；在改革开放深化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导致教育阶层差异的主要模式是资源转化和文化再生产模式并存。

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当前教育阶层差异的主要模式为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所谓利益共同体，是指各方在理性估算的基础上，通常以默契、自发的方式形成的类似利益联盟式的行动体，而利益不同的双方联合在一起的动力所在是互利共存。利益关联的任何一方为了谋求己方的利益，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和保护另一方的利益。在所调查的中学场域中，政府的制度资源、学校的组织资源以及家庭的社会资源之间进行着转换。

首先，制度资源的差异性建构。政府为了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力和资源，并且能够减轻对教育投入的负担，而使制度资源形成差异；其次，城市家庭为学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同时也为子女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再其次，学校在获得资源的同时则为城市借读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提高了学校教师的工作待遇、减轻了政府的投入压力以及扩大了学校声望。在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内，学校、政府、家庭互为主体，相互依赖，一种利益关系来自价值链之外，包括学校与政府利益共享以及来自社会的支持；另一种利益是以学校自身价值链的利益共享，包括学校、教职员工、家庭、学生等。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更加保障了资源在政府、学校以及家庭之间进行流动和转换，使参与资源转换的各方各取所需，满足了各方的切身利益。

另外，根据布鲁芬纳（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态学模式对社会情境的调查给笔者的启示——在他的著作《人类生态发展》中，他区分了微系统——由家庭、教室等单元组成、中间系统——两个微观系统之间的交叉、生态系统——那些超过了直接影响区域、宏观系统——由更大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组成，并将它们作为形成青年发展的层级。在所研究的这所中学，家庭与学校之

<sup>①</sup>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新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2年第2期。

<sup>②</sup>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间的关系、家庭对于学校活动的信任与参与、城市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国家精英选拔的意识形态等等所构成的系统也有助于理解城市家庭子女为何能够在该中学重新获得学业的提高以及未来人生阶梯继续向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 （三）辗转的教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模糊界限

这场从城市到县城的辗转过程，既呈现出了教育空间的转变、城市家庭的教育追求，同时，也如一面透镜深刻折射出长久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讨论和争执。长久以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农村教育落后，鼓励苦学、死读书、题海战术，是应试教育。而城市，教育理念先进，学校条件好，能开展各种活动，是素质教育。

然而，这样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常被作为“应试教育”突出代表的县中的成功却并非完全由于“应试”的因素。考上县中的学生都是通过长期训练和逐级“优中选优”的尖子生，他们在学习方面的天赋加上后天的勤奋与努力，可以说是造就县中模式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县中拥有一批特别能吃苦、工作和生活几乎不分的教师。当然，充分保障学校的软件、硬件等设施也是重要一条。因此，县中的校长们历来不会承认外界对他们搞“应试教育”的评价。

城市所做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吗？对于城市子女异地借读这一现象，人们还没有深入解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往的对异地借读现象的不理解和批评实质上掩盖了城市教育的某种失败的真相。有的城市学校认为自己实践的是“素质教育”的理念，或者对外宣传的是“素质教育”的理念，但是在行动上却只有一部分或者很少在践行这样的理念。因此，这也是一些城市家长在为孩子奔波于各种培训班等无效的情况下产生离开城市学校的原因之一。

这样，问题就变得清晰很多——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解，城市教育代表素质教育，县城的农村教育代表应试教育，那么问题或许要容易解决得多。但是，如果城市教育有时并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而县城农村教育也并非完全是纯粹的应试教育的时候，教育的“辗转”就此形成。也就是说，教育的目标和模式首先均已偏离本身，即都不是一种明确的教育目标和模式，两者之间的界限甚至模糊，并从应该追求的素质教育而转向了应试教育因素较浓的模式，在两极对立的教育模式之间发生摇摆。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给教育所造成的最大的现实性影响，即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也可以看出，异地借读所反映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争论，绝不是单一的教育现象，而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 四、辗转的教育的反思

异地借读，是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界限模糊的背景下进行的，城市家长作出的实际选择，应当是政府和教育部门反思的重要素材。异地借读在辗转的教育中得以实现，而在异地借读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和进一步的研究。

### （一）教育的功利性价值观导致教育失范

在我国，存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对教育功利价值的追求。在中国，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在国人的心中，能否升入高校与个人今后是否拥有名誉、地位和金钱密切相关，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竞争。一些家长清醒地看到，要想在这场竞争中取胜，不仅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不能“输在关键的转折点上”。有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即使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同样被注入了极强的功利性。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成绩好的学生，教育的全部目标也就变成了量化了的升学指标，这些指标与教师、校长的福利待遇、职业发

展挂钩,与学校从行政部门和社会上所能争取到的资源挂钩。集中力量办好几所“窗口学校”,对当地的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窗口学校”的存在,不仅可以用来展示教育业绩,政府甚至可以通过“窗口学校”的发展来减少其本应有的投入和责任。可以说,当前社会、政府部门、学校、个人对教育功利价值观的追求,已使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严重偏离与扭曲。

这些功利性的价值追求也导致了許多教育乱象。一些公办学校通过各种方式,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为名,以“名校办民校”、“转制学校”等方式设租寻租,从而更多地获取资源。民众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只能多花钱,既无奈却又心甘情愿。而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成了教育利益共同体中的重要一方,并没有对这些办学者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对教育市场的介入做出必要的限制。当前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乱收费问题、择校问题、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分配不均衡问题等等,就是教育市场无序状态的一种表现。<sup>①</sup>这种无序的状态和过程是不能体现社会公正的,并且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抱怨。

迪尔克姆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在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改变中,比这种分工本身所要求的道德基础要快,这样会使社会的某些方面受到不适当的控制,从而导致失范的发生。而默顿在他的《社会结构与规范》中将迪尔克姆的失范的观点演化为自己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认为社会失范的形成是社会所规定的合法的奋斗目标与欲达到这些目标而使用的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段之间的分离。默顿修正了迪尔克姆的心理学假设,特别强调达到社会认可的成功目标的合法手段因阶层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当某个阶级的人们无法用合法的手段实现成功的目标时就会产生焦虑甚至愤怒等情绪,这些情绪会使他们有可能采用其他的手段去实现成功而造成一种失范状态。

根据经典社会学家对社会失范的理解和解释,我们可以判定当前的教育是一种失范的教育。

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我国当前社会,从个体、学校到政府对教育功利价值的追求已使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扭曲,在社会对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时,陷于这种状态之中的个体和组织很容易引起行为的失范。

如何从根本上纠正这些教育失范行为呢?一些局部手段和措施当然需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公正地分配了教育的权力、利益和资源。这才是真正改变教育失范行为的关键所在。教育资源的客观丰富程度和努力程度之间并不一定是成正比的。总之,作为教育供给和分配的主体,政府在其政策的执行和引导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能缺失,更需要坚定地予以明确。教育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是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另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几十年政策的惯性延续已经形成一定的利益格局,改变这种格局需要打破利益格局中的诸多主体的利益。为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打破教育利益共同体中的教育不公正的樊篱、率先改变教育的急功近利现象。尽管这一过程也许会很漫长,但是,社会的公正需要这一过程。

## (二) 隐秘与公开的教育不平等

教育不平等是社会学的持久性研究主题,尤其是它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sup>②③</sup>在现实生活中,不管相关政策如何变化,大部分城市家庭尤其是中上层家庭在资源的竞争中占得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体现在异地借读这一过程中,就是城市家庭通过理性选择和资源转换的方式为其子女获得教育机会,并且帮助其获得学业的提高,为孩子未来的阶层上升打下了基础。这些机会和学业结果正是以通过挤占当地学生本来就很有限的教育机会和资源为代价而实现的。然

① 劳凯声:《教育的限度及可能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② 刘浩:《谁获得了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8期。

③ 肖日葵:《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教育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

而,异地借读这一现象自1990年代初开始一直延续,亦说明其一定的隐秘性。

作为属于国家负责买单的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教育体系,我国的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分配存在“双重两元格局”<sup>①</sup>,即普通高中的城乡二元和重点与非重点二元并存的格局。普通高中资源配置在城乡方面体现着强烈的城市中心取向,且这种取向一直存在。在重点、非重点方面,重点中学的制度对高中教育资源的分配也起着关键作用。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高中教育资源既需要一定的选择和收费,但又不能容许太多的市场取向,其资源分配是比较复杂的。因为高等教育的特殊功能,国家对其关注度更高,管理控制更具体。这就意味着在受到外界权力影响的空间方面,高中比高校要大,资源在高中的运作比在大学要简单,付出的代价要小,相对容易被忽视。从这个层面来说,异地借读得以形成、存在、发展的“隐秘”机制正在于此。

其次,接受城市异地借读生的学校校长、教师、当地政府、百姓,并没有感受到教育不公平现象正在发生。他们看到的是,城市学生的到来,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学校越来越响的声望。因此,整个县城都在为借读生的到来感到荣耀。就连当地学生本人也没有警醒到这些城市学生实则是来挤占他们本就有限的教育资源的。

异地借读带来的教育不公平,已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它有着更具体的现实和人道意义。应当进一步通过一些具体的教育机制的改革、利益关系的梳理,从而对教育不平等进行更为具体而全面、生动而理性的思考和政策调整。

(责任编辑:蒋永华)

## To-and-fro Education: Temporary Education Migr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Ji Chun-mei

**Abstract:** It is essential to the studies on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equality to investigate and reflect on the issue of the so-called “to-and-fro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quisition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and the factors involved therein. Through analyzing the data concerning temporary education migration, we term it “to-and-fro education” the fact that the students from big cities temporarily transfer to schools in small cities or towns to improve their test scores. The causes for the to-and-fro education are mainly as follows: parents in the cities have greater access to resources so that they can afford to make such choices; urban parents try to improve their children’s social mobility through education; the boundary between quality education and test-oriented education are not clearly defined.

**Key words:** acquisition 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temporary education migration; to-and-fro education

---

<sup>①</sup>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